

艰苦创业 奋发有为

——忆 1958 年创刊的《贵阳日报》

贵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贵阳市新闻学会

编

艰苦创业 奋发有为

——忆 1958 年创刊的《贵阳日报》

贵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贵阳市新闻学会 编

目 录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宋汪川 李林轩(1)
党委重视是办好《贵阳日报》的根本保证	
..... 李林轩 宋汪川(9)	
难忘的年代	万祥祜(13)
朴实·谦和·严谨	饶鹏飞(18)
感谢《贵阳日报》社的培养教育	陈耀卿(24)
峥嵘岁月忆当年	胡廉夫(30)
难忘的岁月	向志中(34)
强大的精神动力	黄宝山(42)
难忘的记者生涯	徐 平(45)
报社生活的片断回忆	王建熙(65)
初当记者	李成森(70)
跃进声中的记者生涯	曾立勋(75)
艰苦创业 锻炼人生	步云升(83)
赤胆忠心不畏难	黄天云(87)
后 记	(89)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宋汪川 李林轩

1958年创刊的《贵阳日报》，今年已四十周年。写这篇史料，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同志来说，愿能唤起回忆，引起共鸣。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筑城首创的一张大型日报呕心沥血，谱写了讴歌时代、激励人民、催人奋进的篇章。我们这些同志是在党和国家艰苦岁月创业时期渡过的，为建设贵阳，振兴贵州，献出青春年华默默耕耘，这就是无私奉献。

《贵阳日报》是中共贵阳市委机关报。创刊于大跃进的1958年8月1日，停刊于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1961年元月。创刊至停刊历时两年半。艰辛创刊的《贵阳日报》半途夭折，事与愿违，这不是办报人的选择，更不情愿。

创办《贵阳日报》，办日报，出对开版，市委这一决策是有胆有识之举，不仅考虑到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从长计议。市委对办报积极，决心大，措施有力，在人员配备上，设备购置上舍得投入。

创业要充分发扬全班人的顽强拼搏精神

筹办《贵阳日报》市委抽调了四人，另两位同志是唐慕尧、田稚云。我们四人是个领导集体，直至1958年底报社编委会

正式成立。

万事开头难，一是调进报社的同志，谁也没办过报，可谓赶鸭子上架。二是没有印刷设备和纸张。当时的提法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过办报人对吃苦熬夜不怕，担心的是担风险。报纸政治性强，采编排印时间紧，尤其在政治上、政策上出不得纰漏。弄不好就是政治问题，舆论导向问题。责任在身，脑筋几乎天天都是绷得紧紧的。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是没有这番体会的。

根据党的办报宗旨和市委的要求，创刊始，我们就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指针，把宣传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到整个新闻报道中去，而且新闻报道要把握求实求短求快求精。

办报方针确定之后，说难，难就难在人手不足，业务生疏，又没有稿源，每天面临着至少要有两万字以上的文稿见报。疾风知劲草。即使稿荒，我们也不采取多用电稿，或采取剪刀加浆糊的办法转载文章或搞文摘来充实版面。业务生疏即使付出加倍的心血，加倍的时间，也绝不马马虎虎凑凑和和，敷衍塞责。编稿、改稿到定稿要经三人之手，组版经再三推敲、调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象蒸馒头那样、争(蒸)得就一口气。时间再紧不拖期，而且每天要拿出象样的能经得起看的一张报来。因为办报人自觉使命重大，时时会是好象有几万双眼在盯着你。只有努力提高质量赢得读者，来不得丝毫懈怠。

在严峻的困难面前，我们迎着困难上，开始时我们 20 来个人(含后勤人员)靠的就是一股干劲和拼劲。在人力安排上

除几个同志编稿、组版，其余同志全力以赴外出采访和组稿，早出晚归，晚上挑灯夜战，写稿编稿，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疲于奔命，支持不住的时候，伏案打个盹再战。眼睛熬红了，头痛脑涨了，就这样许多同志连续工作三、五个昼夜，仍不下火线。有的同志爱人生娃娃或家里有病人，仍以工作为重，什么也顾不得。让这些同志回家看看或休息个一夜半晌，劝都劝不走。难能可贵的是同志们再苦再累挺起干，没有任何怨言。实际上我们打的是一场消耗战、疲劳战、攻坚战。脑力劳动，手工操作、工夫活，只有如此，别无选择。

采编排印流水作业，那一环节扣不紧，就会延误出报时间。没有印刷设备，印报制锌版，请贵州日报社代印代制版，拣字拼版由新华印刷厂承办，纸张自筹。先从拣字拼版说起，当时遇到的困难现在的人难以想象。拼版师傅没拼过报纸版子，操作生疏，拣字工人因条件差（没有圆架）操作亦不适应，同贵州日报社排字车间的师傅操作速度、质量相比，还有熟练过程、赶超过程。正因为如此，操作既费力、费神又费时，如遇到深夜撤稿换稿，忙得简直不可开交。如出点纰漏，抬版子一时疏忽，拼好的字盘一下翻倒在地（有过几次）师傅们包括值班编辑在内，人人心急如焚，师傅们抱版子太紧张了。还有如字钉，不同型号、不同字体的字奇缺，要临时雕刻。令人钦佩的是李延寿刻字师傅心灵手快，技艺超群。为《贵阳日报》出刊献艺出了力。再说打版，沿用的是原始办法——手工打版，程序很简单，在拼好的字盘上加盖纸型，用刷子均匀的打，打到成型为止。四块版子打好至少要耗时一个半小时。费力耗时、质量又无保证。有时打的纸型不能用，还要把拼好的字盘用版车从六广门的新华印刷厂拖至延安中路的贵州日报社用

机器压纸型。排字车间的工作条件更差，是在又黑又烂兮兮的一大间堆旧物资的旧仓库里打整出点地面凑合着干活的。由于空间有限，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校对同志是挤在不足七平方米的一间黑暗屋里工作（新印厂里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烂厂房）。

印刷厂是挖潜利废，用的是老牙轮转机，铅版上经常出故障，一出故障就断纸。说句实话，印报师傅也巴不得机器运转正常，对老牙机器的确无能为力。但是，遇到断纸最心焦的是值班编辑。每当正运转的机器突然哐啷——哗——呼，纸断裂和急停机的瞬间，听到纸的断裂声，就象撕心裂肺那样阵痛，心痛那新闻纸来之不易。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新闻纸必经中央调拨。我们一位负责同志肩负着用纸的重任，千里迢迢从贵阳到首都，偌大一个北京城，人地两生，进出国家机关，调拨得那么有限的一点广州纸、宜宾纸，看到白白的纸成为黑破白纸，怎么不心痛呢？作为备用的凯里纸，拉力差，断起纸来消耗更大。

条件限制，导致采编、排版、印刷各踞一方，给值班编辑、校对带来几多辛苦。送版样、稿件、纸型、取电稿，送锌版、值班同志不分昼夜从公园南路的贵阳日报社，经公园北路、延安中路到贵州日报社再从延安中路穿中华北路到六广门新华印刷厂，往返几乎奔波大半个贵阳城。特别中华北路、六广门一带，常年挖路，夜间又经常停电，加之贵阳阴雨天气多，烂泥、积水、坑坑洼洼，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遇到霉雨天气更狼狈。因而被撞、跌跤的事时有发生。

编、排时间上的拖长和印刷方面的不顺利，创刊后的《贵阳日报》在两三个月内印完时间往往拖至午后，早报办成了晚

报。

后勤工作，人少事每繁。包括会计、出纳、保管、食堂在内，只七八个人。负责着行政、广告、发行、基建等任务。他们肯干，会理财当家。

比如创刊时所需桌凳，除向市委机关要了几张桌子、长椅，不足部分从旧家具市场选购。为解决职工就餐，在院内因陋就简，搭棚垒灶，办起食堂。购物小件手提肩扛，大件用板车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了尽快摆脱排印困境，一方面抓印刷设备购置，调拨废旧钢材，联系车皮，把原材料运往上海，签定订购合同。一方面抓建厂所需建材和施工。经过半年多的奔波，于 1959 年 9 月一幢含办公室在内的厂房竣工，轮转机与设备随之安装就绪。从此，值班人员奔波大半个贵阳城的辛苦和出晚报的现象宣告结束。为发挥自身技术设备潜力，又添置了脚蹬机，平板机，打这之后，报纸发行已达六万份，财务收支平衡，达到自给和略有盈余。

随着时光流逝，业务水平升华，人员的增加和开辟稿源，办报从被动走向主动。于是致力于质量的深化。报纸质量重在言论，我们成立了言论组，由一位副总编和一位编委负责，并亲自撰稿。与此同时，大家积极练笔，为提高报纸质量，打好自身深厚功底而奋笔耕耘。还有攻版面、攻标题、评报亦形成制度。于是出了许多的好新闻好文章、好版面、好标题、好照片、好插图。每当大家看到佳作时，无不喜形于色，舒一口气。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报纸创刊始，即旗帜鲜明地为大、中、小型企业上马，扶鞍勒缰，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为企业的大上快上鼓与呼。同时紧锣密鼓地深入地报道了当时开展的树先

进、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帮后进、先进更先进的活动。歌颂创业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宣扬工人阶级在跃进中主力军的作用。解放初的贵阳可说是一穷二白。工业只有造纸、卷烟、酿酒、发电、采煤几家小厂矿，还有些手工业作坊。小日用品如墨水、铅笔等都来自外省。1958年大跃进，工业腾飞，填补了贵州工业上的许多空白。如冶金、机械、化工、纺织、建材、食品加工等项目。这些企业为贵州的工业奠定了基础，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增强了国力。同时，解决了城乡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文艺副刊是广大读者所关注的栏目，为贴进读者，贴进生活，副刊设置了“南明河畔”园地，刊出的散文、诗歌、小小说、杂文、影剧介绍、影剧评论、影剧照、书画、照片等。作者来自新老作家和工农兵，可读性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当时没有电视，群众的文化生活，只有电影、戏剧、曲艺杂技，因而报纸文艺副刊在广大读者中占据了一席地位。

《贵阳日报》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报纸也宣传了些过“左”的东西和浮夸现象。如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和一些过激的口号，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等等。

造就了一支高素质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

艰苦岁月创业锻炼人。那时讲学习，讲政治、讲共产主义者信念，讲红与专，讲改造世界观，讲实干，讲贡献，务虚又务实。每个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晚上8点至10点政治学习，党团生活雷打不动。学习空气浓，大家遵守制度非常自觉。

一张报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报纸内容涉及面广，包罗

万象。拿一个版来说，必须作到条块结合，花色多样，图文并茂，有红花、有绿叶、版面匀称，标题醒目，耐人寻味。报纸工作量大，又非常细致。靠什么？靠群策群力，精诚合作。在这一点上，采编之间，版与版之间，后勤同编辑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各自都很主动。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不分份内份外，抢工作干，揽工作干，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好风气。

领导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吃苦熬夜，在所不惜。尤其各组组长，担负的是硬任务。除安排组织好本组的工作外，亲自动手带动一班人。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身教是无声的命令。领导的以身作则负责精神，赢得了同志们的赞扬。

生活低标准，瓜菜代。工作高效率，节奏快。那个时代粮油减定量。比如值夜班的同志，熬一个通宵，夜餐是一块苞米窝窝头，外加一碗“玻璃汤”，即白开水加盐巴，或加点牛皮菜。1960年底因食不果腹，好些同志出现浮肿。照实说，我们这些同志真的象老黄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骥子伏枥，志在千里。五十年代我们这些办报人，年纪大都20至30岁左右，风华正茂，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初生牛犊不怕虎，任何艰辛不在话下，受得苦经得起摔打。正好梁启超所说的“乳虎”、“朝阳”、有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拔山扛鼎的魄力。一个人的终身事业，往往都是在青年时代打下根基的。我们这些同志从年龄结构、政治素质看，是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要求的。

《贵阳日报》创刊至停刊历时两年半，这两年半不平凡，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可谓人才辈出，人才济济。比如部分同志并入《贵州日报》社后，原贵阳日报社的五个编委，分别任命为编

辑部、采通部主任、副主任，贵州日报社成立言论组，推选编辑部副主任唐慕尧同志兼组长，主要工作撰写社论。其余同志分别担任编辑、记者和《贵州日报》四个版的组版编辑。校对组的组长也换成贵阳日报校对组的组长。这就为《贵州日报》充实了一大批办报骨干。随着职称的评定，干部的新老交替，绝大多数的同志评为高级职称，有的晋升为《贵州日报》社副社长。有的晋升部主任或处一级干部。《贵阳日报》停刊留市工作的同志，有的升为市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贵阳晚报》创刊，调进晚报的同志，有的任命总编辑、副总编辑，有的评为主任记者，主任编辑。有的成为作家，国画家及知名人士。置身于教育界的有的评为高级教师、模范教师。有些同志在省市直属单位任职的，晋升为厅局的处长，科长的大有人在，所有同志不论在那条战线任职，都是有所作为的。

《贵阳日报》停刊，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什么，不过我们觉得有三点提出来，可做后人评说。

一、《贵阳日报》创刊，市委领导曾提出：办报人手不足，市委下决心把“秀才”尽可能地调给报社，以量取胜。报社一定要把人培养出来。我们认为在艰苦创业的年代，的确造就了一批人才。

二创刊初，市委曾明确提出：“秀才”调给了报社，市委、市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由报社承担。报社是照办的。文书档案会有记载。

三《贵阳日报》办报人的艰辛创业精神，后人可以借鉴，值得发扬。

(1998年3月12日)

党委重视办好《贵阳日报》的根本保证

李林轩 宋汪川

五十年代末，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一个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地群众运动蓬勃兴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江南大地春来早，贵阳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不分昼夜的奋战在工厂、田野、街头等广阔的大地上。在这催人奋进的大好形势下，中共贵阳市委的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必须办一张自己的报纸，才能更好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推动群众，投入到大跃进的洪流中去。于是，在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倡导下，经市委研究决定：创办《贵阳日报》。可是，要办一张对开四版的日报何其容易，一没有办过报纸的人才，二没有物资设备，完全靠“白手起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试图请求贵州日报从人力、物力上给以支持，但是没有奏效。市委下定决心，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1958年3月，市委正式决定创办《贵阳日报》。

首先，市委下最大决心解决干部问题。先从市委机关抽调四位中层领导干部负责筹备工作，由李林轩、宋汪川具体负责。市委领导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提出具体名单，要谁给谁。在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市委负责同志强调指

出,为办好贵阳日报,各单位必须大力支持,抽调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最好的骨干,输送到贵阳日报。还强调不管调到那个单位的干部,必须随调随到。1958年底,市委派市委常委李延素同志任贵阳日报总编辑。正式成立了编委会,任命了李林轩、宋汪川为副总编辑。1960年1月,市委又调林轩同志任副总编辑,同时,从市委机关、市属各单位、学校和部队转业干部中,选调干部近百人,健全了组织机构,极大地充实了贵阳日报的干部队伍,成为办好贵阳日报的组织保证。

其次,贵阳日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程度高低不一,新闻业务都不熟悉,上百号人都没有办过报纸,怎么能办好贵阳日报?市委负责同志看出了我们的担心和顾虑,曾多次教育和鼓励我们,不懂业务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学习,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要靠你们这些“土秀才”去闯,去磨练,从外行变内行,从“土秀才”变成真正的新闻工作专家。于是,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市委先派了几位干部到贵州日报各个部跟班学习,拜师学艺,虚心求教,经过几个月学习,初步学到了一些办报的知识和技能,成为贵阳日报创刊的骨干。市委又派筹办贵阳日报的两位责任人,先后到广州、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市去学习取经,学习了他们怎样办好市级报纸的经验。在贵阳日报正式创刊之前,市委决定先办一张内部发行的“学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的小报作为试刊,让干部战地练兵,边干边学,从干中提高业务水平。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用高度的政治热情,顽强的学习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初步学会和掌握了新闻工作的基本知识和办报的工作规律,应适

了工作发展的需要,肩负起了办好贵阳日报的光荣使命。

第三,在整个办报的过程中,市委的主要领导伍嘉谟、夏页文等同志都亲自过问,具体指导。比如一个时期的宣传报道中心,市委领导同志都经常给予明确具体的指示,市委召开的重要会议,都叫报社的领导或记者参加,指出报道的主要内容以及配发什么言论,凡重要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市委领导都亲自审阅批发。比如,在大跃进的年代,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真是干劲冲天,敢教日月换新颜。但是,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群众的积极性既要加以保护,又必须加以引导,把这种冲天干劲引到科学的态度上去。为此,市委领导把报社的负责同志叫去,指出必须写一篇把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社论。这篇社论写好经市委审查发表后,遏止了那些乱干蛮干的现象,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市委不仅在办报方向、干部配备、培养提高等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怀和具体帮助,而且在物质条件上也给予全力支持。贵阳日报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市委当时责成有关部门,要给贵阳日报创造条件,给予照顾和支持,只要贵阳日报需要的经费和物资,都要给予满足和解决。比如在经费方面,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所需开支都给予报销。又比如办公用具和印刷厂、电台等所需设备,也都逐步得到解决。特别是为了解决印刷设备和纸张,市委派报社的一位负责同志乘飞机前往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原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付书记)谢鑫鹤同志,由他介绍找到国家计委、轻工业部、北京市委等,经多次联系,申明我们的困难和要求,他们都很同情和支持,在全国新闻用纸和钢铁用材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下，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对贵阳日报来讲，不仅解决了办报工作上的一大关键难题，而且使报社的全体职工压抑很久的思想，一下子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高兴，工作起来更加有劲有力。在市委的亲切关怀下，到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贵阳日报的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至此贵阳日报社就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工作、独立自主的“独立王国”，贵阳日报也成为贵阳市委指导工作的有力工具，成为贵阳市人民爱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了。

贵阳日报从创办到停刊，经过两年半的历程，这是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也是为贵阳市的新闻事业开辟道路，奠定基础的里程碑！

(九八年四月写于贵阳)

难忘的年代

万祥祜

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

贵阳日报诞生前，在贵阳的历史上还没有办报史，也没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市组织部门在报社创刊前后，为采访组调来三十人，他们来自部队、学校、工矿、政法、农业、财贸、卫生部门，可谓工农商学兵都有。从地区看有的来自西藏雪原，有的来自南海之滨，也有的来自黑水白山和川滇边陲，是东西南北中人员齐集。共同的一点都未办过报纸，可贵的是大家把办好党报视为已任。

一九五八年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各条战线战天斗地，赶超先进、敢想、敢干、敢闯、劳动工作热情高涨，刚从事新闻采访的同志们，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敢做，要做好过去未曾从事过的工作，争往自己的肩上增压担子。学中办报纸，写中学新闻，从当做新闻工作的小学生做起。

报纸创刊以后，经过报社和组织部门的努力、采访组终于分来了三位从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科班生，他们是马伯伦、沈伟民和李晓林，一到工作岗位，不怕条件艰苦，

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投入第一线采访工作，同时，他们又成为全组新闻采访的业务辅导。当时，采访组下设六个小组，工业、农业、财贸、基建、街道和文教小组。全组三十人挤在三间简陋的办公室中，要是全放桌子，那就坐不了人，只有一张三抽桌，二、三个人打伙用。开个全组会，只好有人在房内，有人站在走廊上。白天采访的稿子晚上带回家写，但听不到一句怨言。

夜以继日，忘我工作

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采访人员每天工作不是八小时，而是平均在十四小时以上，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和奖金。白天办公室很少有人，都下基层采访去了；晚上办公室一片灯火辉煌人满为患地加班赶稿。其他版组的编辑说：“采访组的人都是夜猫子”。平时采访大家全靠两条腿跑，却没有叫累；家中发生了各种困难，也没有人叫苦；身体有病医生开了很多假条也不休息；有的在外地的父母去世，也强忍泪水坚守工作岗位。采访劳动竞赛也搞得热气腾腾。记者马伯伦、何寿秋因劳累过度，旧疾肺结核又加重咳血，医院多次嘱咐要休息，他们藏起病假条仍照常下厂；女记者张必贤，王续业孩子病了，白天没时间带他们看，晚上进医院后又背着孩子在家中写稿；采访大炼钢铁的韩念一，经常和炼钢工人一样四十八小时不下火线，在炼钢炉前随时传递新战果；农业记者陈明义，白天采访完惠水的“三秋”现场会，为了赶上第二天的排版，从下午起连夜步行五十五公里，赶回到报社天还未亮，抱着挎包和稿子，在报社的走廊里就坐地睡了一觉。由于工业记者在劳动